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SCI)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政法类核心期刊

ISSN1004-8049

CN11-3152/K

太平洋学报

Taipingyang Xuebao
PACIFIC JOURNAL

(月刊)

第26卷 第1期 Vol.26 No.1

(1993年创刊)

2018

- 关于海洋强国战略的思考
贾宇
- 特朗普“美国第一”安全战略与中美博弈
滕建群
- 建构以实践为导向的可持续和平——新型大国关系的再解析
金灿荣 张昆鹏
-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
刘建飞 谢剑南

太平洋学报

第二十六卷 第一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

海洋出版社



PACIFIC JOURNAL

Vol.26 No.1

太平洋学报

(月刊)

2018年(第26卷)第1期

《太平洋学报》编辑委员会

顾问: 吴敬琏 张登义 鹿守本

主任: 张宏声

副主任: 石青峰 杨绥华

主编: 丁磊

副主编: 杜钢建 金灿荣 罗肇鸿

戴桂林 李国强 贾宇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凡 小原凡司(日本) 王义桅

王校轩 王逸舟 王琪 王斌

田新建 史春林 朴键一 曲探宙

朱坚真 朱锋 朱瑞良 庄芮

刘仁山 刘江永 刘建飞 刘容子

安仁海(韩国) 孙小迎 孙吉亭

孙学峰 严安林 苏浩 杜钢建

李红云 李国强 杨伯江 杨金森

杨泽伟 杨绥华 肖洋 时殷弘

吴士存 吴敬琏 吴磊 余民才

宋伟 张文木 张国有 张洁

张振江 张海文 张蕴岭 阿东

陈文玲 陈玉荣 陈须隆

陈勇(美国) 林民旺 林宏宇

罗肇鸿 金永明 金灿荣 周大地

周琪 郑海麟(加拿大) 赵龙跃

胡金焱 胡念祖(中国台湾) 胡德坤

柯昶 秦为稼 贾宇 夏善晨

倪峰 徐光裕 翁立新 高世楫

高恒 鹿守本 商乃宁 韩锋

韩增林 傅梦孜 傅岷成(中国台湾)

鲁义 雷波 翟崑 潘敏

潘新春 戴桂林

C. Raja Mohan(拉贾·莫汉, 印度)

Michael Pillsbury(白邦瑞, 美国)

目次

海洋强国建设

关于海洋强国战略的思考 贾宇(1)

黎塞留的海权思想与法国近代海权的形成
..... 胡德坤 李想(9)

政治与法律

特朗普“美国第一”安全战略与中美博弈 滕建群(18)

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于宏源(25)

建构以实践为导向的可持续和平
——新型大国关系的再解析 金灿荣 张昆鹏(34)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
..... 刘建飞 谢剑南(47)

“一国两制”规范创新的中国智慧 李志永 袁正清(64)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误区与理论探索
..... 杨国桢 王小东(75)

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对接俄罗斯北方航道复兴
——从认同到趋同的路径研究 赵隆(82)

热点问题笔谈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振宇(92)

CONTENTS

Building China into A Strong Maritime Country

On China's Maritime Power Strategy JIA Yu(1)

Richelieu's Thought on Sea Power and the Formation of Sea Power of Modern France HU Dekun LI Xiang(9)

Politics and Law

On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America First* and the Gam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ENG Jianqun(18)

The Adjustment of Trump Government's Climate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s YU Hongyuan(25)

Constructing a Sustainable Peace of Practice Oriented—Re-analysis of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JIN Canrong ZHANG Kumpeng(34)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l of Sino-American Major-Country Relations LIU Jianfei XIE Jiannan(47)

The Norm Innov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Its Chinese Wisdom LI Zhiyong YUAN Zhengqing(64)

Pushing Ahea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YANG Guozhen WANG Xiaodong(75)

Aligning the Blue Economic Passage leading up to Europe via the Arctic Ocean with Russia's Reviving Northern Sea Route: From Identification to Harmonization ZHAO Long(82)

Discussion on Hot Issues

The Role of China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UN Zhenyu(92)

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
所刊发文章不代表本刊观点

本刊启事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等多家数据库收录。若作者对此有异议,请在来稿时向本刊说明,本刊将作另行处理。

《太平洋学报》编辑部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01.005

金灿荣、张昆鹏:“建构以实践为导向的可持续和平——新型大国关系的再解析”,《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第34-46页。

JIN Canrong, ZHANG Kunpeng, “Constructing a Sustainable Peace of Practice Oriented—Re-analysis of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Pacific Journal*, Vol.26, No.1, 2018, pp.34-46.

建构以实践为导向的可持续和平

——新型大国关系的再解析

金灿荣¹ 张昆鹏¹

(1.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要:“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思考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产物。它既是中国关于自身角色的自觉与自信,也是对“中国向何处走”的初步回答。新型大国关系以追求可持续和平为核心目标,坚持以实践为导向来调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近五年来的实践表明,新型大国关系满足合目的性与合理性的双重要求,而且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已经得到初步的验证。作为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生事物,它必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实践;可持续和平;历史自觉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8)01-0034-13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国际关系的最新论述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①。相较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而言,“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升华。特殊与一般(或曰普遍)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但就现实问题的导向而言,特殊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大国在国际关系当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复兴中的

大国面临着同守成大国之间不可回避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期间两次重复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容,部分美国保守派精英将此视为“送给中国的一场外交胜利”^②。这种输赢式的对抗性思维间接地反映出“新型大国关系”在美国仍未获得真正的理解^③。故此亟需我们跳出政治话语的范畴,从更一般的学理层面上进行再解析。

收稿日期:2017-11-18;修订日期:2017-12-15。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课题“大国关系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05JZD00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金灿荣(1962—),男,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张昆鹏(1988—),男,辽宁朝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

① “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全文)”,中国网,2017年10月18日,http://www.china.com.cn/c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

② Simon Denyer, “In China Debut, Tillerson Appears to Hand Beijing a Diplomatic Victory”, Mar. 19,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in-china-debut-tillerson-offers-reassurance-receives-praise/2017/03/19./62094abc-0c66-11e7-8884-96e6a6713f4b_story.html?tid=sm_tw&utm_term=.931b7b681131.

③ Jinghan Zeng and Shaun Breslin, “China’s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A G2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2, No.4, 2016, pp.773-794.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 基本内容与演变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指引中国对外关系实践的概念,从最初的雏形到最终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期间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实践积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对外战略中,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容得到了成熟、完整的表述,其含义愈加丰富、愈加具有系统性。

1.1 “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梳理

20世纪9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到新阶段的中国对于融入世界的战略选择更加坚定,对于“安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论述。面对世界格局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了“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①。在新安全观指引下,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江泽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到,“条约摒弃了那种国家关系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冷战思维,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上加强互相理解、信任与合作,确立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②。这是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初实践,为此后深化中俄间的战略互信奠定了良好基础。

伴随经济迅猛发展所带动的中国“伟大民族复兴”,引起了美国在战略层次的高度警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迅速扭转了美国的国家战略,将战略重心拉回到传统的国家竞争轨道^③。被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战略上锁定,中国的战略安全压力骤然间迅速上升。自此,美国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头号对象国。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④。2012年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接受

《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双方应有充分信心、持久恒心,始终抓住共同利益这一主线,不要让这样那样的矛盾、分歧左右中美关系大局,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⑤。2012年5月,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讲话,他指出要在思维上“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同时,呼吁中美双方“抓住机遇,排除干扰,共同努力,走出一条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⑥。

2012年11月,“新型大国关系”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⑦。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庄园会晤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精炼地概括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⑧。此后,“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与话语之中被直观地认定为一个

①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论述”,人民网,2014年7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30/c371956-25370977.html。

② “江泽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 纵论国内外大事”,中国新闻网,2001年8月30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8-13/26/112854.html。

③ Georg Löffmann, “The Pivot between Containment, Engagement, and Restraint: President Obama’s Conflicted Grand Strategy in Asia”, *Asian Security*, Vol.12, No.2, 2016, pp.92-110.

④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由来”,人民网,2013年6月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07/c1001-21774134.html。

⑤ 常红、康登慧、陈冰洁:“综述: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外交战略是这样炼成的”,人民网,2016年2月13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213/c1002-28120530.html。

⑥ “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人民网,2012年5月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7804148.html。

⑦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2年11月8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11.html。

⑧ “杨洁篪谈习近平与奥巴马庄园会晤成果”,人民网,2013年6月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09/c1001-21803579.html。

专门指向中美关系的概念^①。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尽管从未公开使用过“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但对其内涵展现出一定的理解^②。十八大后,中国政府的外交实践以及美国新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内容的表述证明,“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中迈向成熟。当然,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对新型大国关系所蕴含的政治智慧的运用并未局限于中美关系^③。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摒弃了美国中心化的模式,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活力得到了充分地释放。

1.2 “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容

“不冲突、不对抗”,既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必要前提,也是对中美双方之间战略意愿的要求。大国间存在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但这恰恰要求大国不能在战略意愿上放纵冲突或者消极对抗,更不能把冲突理解为某种必然真理的逻辑。就中美关系而言,这一要求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在有关中国的表述中,西方世界的主流话语更倾向于使用“崛起”,而中国的官方话语更多使用“复兴”。学界并未深究两者间的差异^④,因为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学界看来无论是“崛起”还是“复兴”,都意味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并由此引发既有世界力量格局的大变动。从历史经验看,“历史上大约有过15次新兴大国的崛起,其中有11次与既有大国之间发生了对抗和战争。”^⑤“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成为历史演进中的一条悲情‘铁律’,西方历史曾不断重演这一悲剧”^⑥。尤其是经过“结构现实主义”演绎,新兴力量与守成力量之间的未来,被“科学”地演绎为必然的冲突。然而,根据美国学者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统计分析证明,战争的根本性起源并非是权力转移,而更多的是源于恐惧、激情等非理性的动机^⑦。

“相互尊重”,是中美作为大国相处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尊重彼此的核心国家利益是这一基本原则的最低要求。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

展道路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⑧。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的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⑨。美国的核心利益围绕其全球地位展开,具体包括“国家安全、经济繁荣、价值观优越性以及国际秩序稳定”^⑩。更高层次上,则要求大国能够在不同文明之间互相尊重、包容互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

① 在学界,有学者指出尽管“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运用不局限于美国,但实际上对俄使用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欧(欧盟)使用的是“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而且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没有使用过“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因此,无论从中国的外交实践还是美方的理解、运用来看,“新型大国关系”都应当是中美关系中的特定概念。参见:王缉思、仵胜奇:“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世界知识》,2014年第10期,第2-7页。

② “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芬兰并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新华网,2017年4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4/09/c_129527847.htm。

③ 常红、康登慧、陈冰洁:“综述: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外交战略是这样炼成的”,人民网,2016年2月13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213/c1002-28120530.html。

④ 在国际关系当中,话语的运用实际非常重要。西方社会中关于中国的“客观描述”与中国无关,因为“这些确定‘知识’的获得,与近代以来巨变中的中国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源于西方以现代理性主体自居时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参见:[澳]潘成鑫著,张旗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

⑤ “王毅: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人民网,2013年9月2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21/c70731-22982621.html。

⑥ 金灿荣:“告别传统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人民日报》,2016年4月17日。

⑦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97-227.

⑧ “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人民网,2014年7月9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10/c64094-25261696.html。

⑨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第7页。

⑩ 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103页。尽管核心国家利益的排序会因具体情势的变化而有调整,但从整体而言其内容具有非常高的稳定性。例如,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绝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它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只是调整了其利益的排序。

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①。

“合作共赢”,不仅是对大国关系在思维层面的深度改造,更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方法。当今世界,资本、技术与信息在全球范围依靠发达的网络高速流动,跨国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优的资源配置,中小企业也利用网络在世界市场中寻找机会。经济的全球化并未因反全球化现象而停止,以中国、印度、越南为代表的广大新兴国家“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后劲”^②。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结盟、对抗为基底的大国关系思维越发显得扭曲,它从心理上先验地创造出敌人的形象,再进入现实中寻找与之对应的具体对象。究其根源,这一思维的核心在于霸权国对可能丧失全球领导地位的恐惧^③。面对全球高度互联的现实,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他国行动负面效应的外溢,尤其是存在广泛外部利益的大国。唯有大国间合作才能在根本上确保国际秩序稳定,进而实现实质的国家安全。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的演讲所指出,“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④。

从战略意愿到基本原则,再到思维方式,内容的背后不仅有着基于历史教益的深刻指向,同时也根植于当今的时代背景,既立足于“微观”层面的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又着眼于全球范围内权力格局的变化。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容表明,它不是单纯理论规范的表达,而是在面对复杂环境下,为大国当如何实践指明了进路。

1.3 “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演变

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到“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再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实践导向的特点始终贯穿于内容变化的全过程。在语言表述变化的背后,昭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精神变化——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自觉。正是这种历史自觉,为中国的战略自信与战略定力奠定了精神根基。在处理大国关系的实践中,中国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理论范式,而是凭借对大历史环境的科学判断来不断推进艺术性、根本性的操作。尤其是当超级大国因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而陷入自我想象的焦虑时,中国以崭新的话语、自觉的实践来突破西方所谓的“科学”定律。考察具体的历史背景与中国的实践,新型大国关系含义的演变脉络完整地展示了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的过程。

在自发阶段,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的成长期,综合国力尚未在世界权力格局中获得重大改观。因此,即使是美军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也未能从战略上扭转中国的发展方向。炸馆事件后,时任江泽民主席谈到,“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我们要卧薪尝胆,一定要争这口气”^⑤。中国要想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就离不开一个长期的、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陆上邻国,两国当时存在着较大范围的领土划界争端,在历史上既有结盟又有对抗。中俄“建立和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睦邻友好的新型国家关系”^⑥,是中国为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而实施的自发行为,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①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国青年报》,2014年6月29日。

② 傅莹:“在充满不确定形势下看经济全球化”,《中国中小企业》,2017年第2期,第67页。

③ “其实,最大的敌人是恐惧本身。我们自身的恐惧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消耗巨大的经济、人力、政治和外交成本,而原本只有一两个大国才能让我们如此疲于奔命”。参见[美]罗特科普夫著,孙成昊、张蓓译:《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12页。

④ “习近平: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新华网,2015年3月2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3/28/c_127631642.htm。

⑤ 江泽民著:《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324页。

⑥ 江泽民著:《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306页。

济体,美国政府已经迅速从反恐战争中抽身,推动“亚太再平衡”将战略矛头直指中国。面对外部战略环境的骤变,中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由自发上升为自觉,即主动思考如何处理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结构性矛盾”。从2010年至2012年间,中国不仅多次在重要场合阐述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而且将“新型大国关系”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从中美元首2013年庄园会晤到2014年“瀛台夜话”再到2015年“白宫秋叙”,中方坚持不懈地向美方阐述新型大国关系。但从奥巴马政府后期的行动判断,中国的努力未能打消美国对华的战略疑虑。^①在美国保守主义精英看来,“当下,华盛顿将中国纳入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方法,是以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和全球性主导地位为代价的”^②。

十八大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入自为阶段。一方面,中国不断强化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大国的合作,从战略型合作到功能型合作再到议题型合作,持续拓展合作的范畴。特别是在同美国的合作方面,中国加强了对美国的投资力度,在实现自身资本优化配置的过程中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③。另一方面,中国向美国乃至世界阐明了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哲学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不止于解决中美面临的结构性冲突,更是为了人类共同命运的永续。“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④,尤其是以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着人类命运的整体,不分国家、不分阶级。

二、可持续和平——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目标

惨烈的大战记忆、核武的恐怖破坏力以及国家间的复杂相互依赖增加了人们对于可持续和平的真诚,大国角力的同时也在极力地避免陷入到直接战争的状态。在冷战背景下,战后

确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和平机制未能获得充分的发挥,甚至有时沦为超级大国操纵的工具。苏联解体后,美国把自身对霸权的贪婪偷换为他国意图谋取霸权的野心。因此,中国对自身主权、安全利益合法、合理的诉求统统被视为中国意图取代美国霸权的“铁证”。作为对现实可能性进行科学阐释的“理论”具有真理性,但是绝不能把逻辑真实偷换为客观真实。因为在现实中,是由行为体所选择的“可能性”随着实践落定为客观真实。新型大国关系代表了不同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另一种具有真理性的逻辑真实。因此,在不同的可能性面前,国家之间最终是否走向战争是一个选择问题而非科学问题。新型大国关系选择将可持续和平作为首要目标,根本在于中国确信存在可持续和平的真理性逻辑。

2.1 “和平第一”——源自历史的经久教益

人类对于“和平与战争”问题的思考同人类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最早的记叙可以追溯至雅斯贝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尽管那时的人们生活在相对隔绝的世界,却对诸多元问题(包括和平与战争)进行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记叙。“在思想、行动和创造的领域里,在对伟大事物的沉思冥想中,历史作为永久的现存而发射出光芒。它不再满足好奇心,而是成了令人鼓舞的力量”^⑤。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在源初时代的记叙演绎着超越历史的意义,尤其是处在大历史转折中的人们多倾向于回溯历史以求得一个确定性的起点。从“9·11”事件打破超级大国绝对安全的幻觉,到2008年金融危机

① 李燕燕:“战略互疑、安全困境与中美关系解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3期,第48-59页。

② Robert D. Blackwill,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 2015, p.6.

③ “2015年中国对美投资创历史新高”,商务部网站,2017年4月14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604/20160401296492.shtml>。

④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国新办网站,2017年1月19日, <http://www.scio.gov.cn/zxbd/tt/xjp/Document/1540543/1540543.htm>。

⑤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17页。

打破市场的神话,再到特朗普当选破除对美国政治的魅拜,就如同大航海之后的西人远来,发现清朝之中国远非马可·波罗之中国,开放超三十年后的国人也开始普遍地认识到,今时之美利坚、欧罗巴亦不再是理想之所归。当面对如何回答诸如“和平与战争”这样重大的问题时,回归到中国自身的历史再出发就成为了一种可行的路径。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在中国人的思维里,“和平与战争”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它将战争始终视为服务于和平(政治)的手段,而民心向背与全民整体的根本利益构成国家最大的政治。当然,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尽管汉、唐、元、清等王朝不乏有大规模的对外远征,但“和平第一”在中国的对外交往史上始终是一种常态。因此,在武力征伐的运用上,中国的战略实践缔造了独具中华特色的战略保守主义文化。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司马法》比《孙子兵法》更能反映这种战略保守主义文化的意涵。

《司马法·仁本》:“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它不仅开明宗义地指出战争不过是政治的手段,更进一步指出背离根本民益(即破坏当时人们赖以维持存活的农业生产)的战争终将导致国家灭亡。战略保守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战略实践中依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例如上世纪的两场自卫反击战争。中国以有限战争的方式彻底破除了对手的战略讹诈,但是从未因战争的胜利而迫使对手接受苛刻的政治条件。战争作为一种破坏性存在,注定不可能成为人类所追求的长久目标,故而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战争与和平关系问题上始终牢固树立起“和平第一”的实践理念。

或许有反驳意见认为“和平第一”的历史教益有其存在的特殊历史背景,并不具有普遍的

意义。诚然,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国家,一方面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需要维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可提供的战争潜力也无法支撑长期的战争活动。再进一步讲,最初兴起的工业国家无一不是以殖民侵略的方式完成原始积累。这样的反驳显然忽视了对战争作为手段的效用的考察。在农业文明时代,国家的防御能力依赖于所拥有土地的规模,而战争则是开疆拓土的首要方式。然而,美国崛起的历史表明:占领对方的市场比占领对方的土地拥有更高的性价比。占领市场的根本不在于坚船利炮,质优价廉的产品才是在竞争中获得胜利的基础。仿照农业文明下的推理逻辑:工业文明时代的国家,一方面需要和平的环境来保障市场的有效、稳健运行,另一方面工业化造成战争破坏力的急剧上升(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遏制了国家间战争的冲动。尽管两种逻辑的内容存在差异,但“和平第一”的历史教益依然成立。

2.2 大国协同——可持续和平的根本基础

以往探讨大国关系与和平之间的联系主要集中于两大概念:大国均势与大国协调。如果说前者建立在强烈的历史艺术性之上,那么后者则根植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冷战后的再次崛起。两者都存在合理的成分:大国均势的核心在于“均势”,这一概念以欧洲历史为背景,是状态、观念、手段三者的统一^①。在当代“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下,“平衡”外交是均势思想在外交实践中顽强的延续。大国协调“主要通过会议外交和协商、共识来决策,并依据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等共有规则与规范行事”^②,机制性或者规范化是其与大国均势之间的本质区别。二者之间并非相互排斥,平衡作为手段意义上的“均势”在大国协调当中也屡见不鲜。均势与协调作为有序的状态,先

^① 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冷战后时代的思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第15页。

^② 郑先武:“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49页。

验地被看做人类理性选择的必然,然而协同学的研究证明,从无序到有序之间转变的真正奥秘在于系统的自组织性。用协同学创始人哈肯的话说:“单个组元好像由一只无形之手促成的那样自行安排起来,但相反正是这些单个组元通过它们的协作才转而创建出这只无形之手”^①。从协同的视角来看,均势、协调都只是协同的具体表现形式。

原本相对隔绝的世界因人类的大航海活动而日益紧密地联结起来,人们意识中的世界逐渐超越传统经验的范畴,最终遍及地球的全部。特别是战后的两极格局,促使国家间关系在不同阵营内部深度联结,为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奠定历史基础。“虽然它们(指大国)为了在体系中获取相对优势而玩弄手段,但全球化不仅统一了所谓‘国际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深层客观利益,也整合了它们各自主观看法的核心基础”^②。核武器的存在极大地削减了大国对于相互间战争的冲动,大国对于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的一致认同自然地“消除”了大国内部的“革命者”——诸如18世纪的法国或者20世纪的苏联。因此,能够在当下对各大国政权合法性构成普遍性挑战的根本理由在于其能否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③。

和平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和平为保障发展提供基础环境,发展则为维护和平提供可靠的物质支撑。国家间冲突的有效解决,要么通过大国协同达成一个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各方利益需求的方案,要么通过霸权国的强制力进行“仲裁”。后一种方案成本巨大,且常常效果不彰。究其根本,霸权者的“仲裁”缺少国际与国内合法性,这不仅无法有效解决矛盾,反而会成为矛盾再次爆发的重大隐患。因此,矛盾越激烈的地方就越需要大国协同。对发展的共同追求是大国协同成为可能的前提,大国协同反过来又构成和平发展的根本基础。

2.3 现代主权国家——可持续和平的合法性奠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开创的主权国家体系,因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而成为第一个世界

性国际体系,主权的理念、原则随着二战后欧洲殖民体系的崩塌获得了普遍的确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公约》的签署,标志着人类近五百年来为求得尊严的斗争获得了根本性胜利。保护人权、主权平等原则等成为庄严的国际法规范,以往那种凭借暴力方式夺取土地、财富、人口的行为彻底丧失了合法性。主权体系的架构令国家走出了帝国体系下的“丛林法则”,一种新的生存逻辑获得确立。

在工业革命初期,欧洲大国通过殖民掠夺完成最初的资本积累。随着工业革命日渐深化,大国精英们发现竞争胜利的根本在于占领市场,最有效的武器是质优价廉的商品、独一无二的技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市场应当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④,它使得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巨型单一市场同世界相连接。在市场竞争愈加充分的环境下,规则制定权则成为了另一种高效的战略工具。凭借大国协同,能够树立起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普遍规则,从而在实践中转化竞争优势。

把视线从世界整体的历史变迁拉回到中美关系的范畴。美国不是一个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承继传统帝国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复合体,美国学者对此从不讳言^⑤。作为帝国的美国对于中国具有一种霸权本能的不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正是基于帝国霸权思维的产物。然而,美国的建国史为其天然地铸入了现代性的一面。中国积极主动地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唤醒美国现代性的一面并遏制其内在的帝国冲动。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没

① [德]哈肯著,凌复华译:《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② [美]佩里·安德森著,张瀚天译,海裔校:“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协调”,《文化纵横》,2017年第1期,第22页。

③ “发展”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它既包含含量的增长,也包含质的提升,又兼有结构的优化。

④ “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一位外国观察家曾经感慨:人类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始的”,参见“人民日报评论部: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人民网,2013年11月21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1121/c1003-23607892.html。

⑤ Jim Garrison, San Francisco, *America as Empire—Global Leader or Rogue Power*,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4. p.5.

有中美关系的稳定,可持续和平就无从谈起。

“天下观”是源初中国看待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基本图式,尽管当时的天下并不是真正的“天下”,但“天下”概念具有囊括当今天下的延展性。使用“天下”绝不是幼稚地鼓吹复古,而是从中华文明内部寻求可为世界共享的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天下观”在当代世界的再创造,并且获得了世界的认同——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近代历史上,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正是源于为人类共同命运而战的历史性贡献——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核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了人类世界的整体真实,破除了贪恋霸权的“心中贼”。新图式指引下,中国构建了一个遍及全球、层次明晰、内容多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新实践。如果说同盟的封闭性结构天然地造成了他者的恐惧,那么伙伴关系网则为他者的融入提供了开放空间。新型大国关系是整个伙伴关系网中的一个类型^①,不能因文字表述而忽略其内在的伙伴关系特质。

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协同性的大国关系,它由中国率先提出的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及迫切的时代要求。同时,它也包含着一个伟大民族对于和平问题的高度使命感。“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不是孤立的,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等一整套的论述、实践相互联结。透视其可持续和平的逻辑需要借助一个整体图景:以主权国家体系的一般性伦理原则——主权平等——为基础,以新的生产关系——经济的全球化——为支撑,以新的人类愿景——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以大国的实践为动力构成了新型大国关系可持续和平的系统性逻辑。

三、实践导向——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方法论

实践是联结理论与现实的根本方式,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是问题发生的根本源泉。以实践为导向不是要否定理论对于现实的指导

意义与能动作用,而是强调理论的根本依据在于实践,理论无法解释实践时应当修正理论,而非刻意地扭曲实践以求符合理论所勾画的图景。对此,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②。

回顾“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实践,中国并未拘泥某种固定的理论形态,而是坚持实践导向的一般方法扎实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实践导向”的方法有三条基本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分析,值得进一步展开。

3.1 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着眼点聚焦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正是建立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实事求是的评估之上。从国内大局看,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③。从世界的南北格局来看,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普遍性矛盾。从具体领域看:经济上,中国经济面临着结构升级转型、增长速度下行的严重压力。安全上,美国对华的战略不信任增强,加大了在中国

^① 著名学者倪世雄教授就认为,上世纪末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参见:倪世雄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271页。

^③ 《中国共产党章程》,共产党员网,2017年10月24日, <http://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周边的军力部署,周边同中国存在领土权益争端的国家也在伺机而动。科技上,新一轮的科技竞争加速,美国依旧在全球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国际大局看,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世界秩序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政治上,新一轮强人政治出现,民族主义与反全球化思想回潮。经济上,世界经济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仍增长乏力。安全上,传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的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持续攀升,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

作为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向何处去”具有超越自身的世界性意义。因此,必须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去看待中国问题。纵览大国兴衰的历史,每个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良好制度。中国内部改革的最终制度呈现就是要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逻辑展开的起点已经悄然从“统治”转向了“治理”。对于以“统治”为逻辑起点的欧美民主模式所面临的政治衰败而言,以“治理”为逻辑起点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是对“娜拉死后怎么办”的有力回答。在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上,治理逻辑在内外之间得到了统一。中国高举全球治理的旗帜,走不同定位的伙伴关系之路,从思维的深处扬弃以往大国的霸权旗帜与以结盟划分势力范围的老路。当然,这种解释对于将西方语境下的自由、民主视为信仰的人而言非常困难。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①。只有解放思想方能从思维深处破除愤怒、恐惧甚至仇视所造成的认知障碍,真正地做到实事求是、引领时代。从宏观的时代背景到中观的中国变革再到微观的外交实践,一系列的新变化、新现实、新实践、新观念都对以往大国关系的范式提出了有力挑战,中国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和平,部分西方现实主义开始“修正”对中国问题的判断^②,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先生曾直言“目前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难以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论与现实之

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和滞后”^③。

3.2 将问题置于实践中化解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现实问题纷繁复杂,既有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基本问题,也有贸易、汇率、移民这样的具体问题,当代又出现了以网络、生态为代表的新问题。无论老问题还是新问题均源于人的国际实践,即人们所从事的各种各样跨越国界的生产、交换以及分配等活动。不同类型行为体的跨国实践将国家、社会与个人联通起来构成了一个复杂巨系统,不同的行为体又在与系统的互动中认知自身利益、构建身份认同、作出理性选择等等。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从“社会转向”向“实践转向”转变^⑤。

在国际实践中,大国间存在利益矛盾是常态。与此同时,国家也会因各种内部变动而产生新的利益排序,新排序会随着国际实践而产生外溢效应。以中美关系为例,国际领导权是其中的一种稀缺性资源,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希望在最大程度上获取国际领导权,这

① “邓小平同志对解放思想作了科学阐释”,人民网,2012年10月21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021/c350531-19334732.html>。

② 参见[美]G·约翰·伊肯贝瑞著,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译:“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第66-71页;[美]罗伯特·萨特著,郎平译,周琪校:“中国崛起的挑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含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17-26页;[英]马丁·雅克著,徐海娜译:“变化世界中的多元化治理: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当代世界》,2015年第2期,第21-24页。

③ “驻英大使:不应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待中国崛起”,中国新闻网,2010年12月5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12-05/2700804.shtml>。

④ 中央编译局编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⑤ 参见秦亚青著:《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朱立群、聂文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98-115页;朱立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第19-33页;李晓燕:“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一种‘实践理性’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3期,第27-43页。

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主导权之争。当前,中国对外战略由“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这意味着中国将有条件地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与之相反,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实践中表现为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退缩。中美的行为都是基于利益排序调整对外战略,但对国际领导权的竞争始终如一。

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次简单的理性选择,它依赖于一个个具体的实践过程。在实践中,主体会选择适当的绩效行动并在互动中建构起共同背景知识,共同背景知识的扩张具有开放性,进而在适当绩效行动与共同背景知识的互动演化中逐步形成“实践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对于问题性质的判断、处理方式以及处理机制,相对基于个体本位的逻辑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性质判断上,问题不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在处理方式上,可供选择的手段更为灵活。在处理机制上,共同体内部通常有一套制度化程序,或者是一套隐性的处理机制。在实践的视域下,即使问题无法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得到解决,但可以防止问题滑向失控的极端状态,为问题的最终解决获取时间与空间。实践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动力,不要指望问题能够脱离实践而自动消失。

3.3 在实践中发展理论真理

人类凭借理性的逻辑分析与归纳,在长期的积累中整理出关于实践的一般性、规律性的总结。这种一般性的总结符合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经验,但同时又兼具超越原始经验的一面,其超越性的部分就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实践的检验也不是简单的一次性过程,它既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更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践行真理的过程中不能从教条出发,把实践与真理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实践与真理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既要真理在现实中践行,又要能够在实践中对真理进行修正甚至是扬弃。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实践与真理间关系的标准。随着改革持续深入的推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

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四个有利于”的新标准。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流理论范式明显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理论构建的基础来源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古希腊、古罗马作为整个西方历史叙事的源头,这段时期的历史记叙在思维深处塑造着今天西方世界理解国际关系的思维。从古希腊、古罗马到17、18世纪的欧洲,再到两次世界大战至冷战,从整个西方世界粗线条的历史看大国关系,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呓语。然而,将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适用于全球化的世界,则超越了理论有效性的空间,必须被重新加以检验。好比将航母置于眼前它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若置于汪洋大海它不过是一叶扁舟。古代中国所主导的亚洲地区虽然偶有征伐,但从整体而言维持了一个长达千年的国际和平。对于国家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中国人有一套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逻辑体系,有史学家视之为未来世界的希望^①。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既源于古代中国历史的滋养,也是中国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追求实现可持续和平的一次伟大创新,更是从中国自身经验中提取一般性理论进而指导实践的尝试。从过去近五年的实践来看,新型大国关系取得一系列的成绩。中美关系,中国积极管控中美关系的大方向,主动对美沟通、增信释疑,遏制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中俄关系,中俄在重大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都保持了密切配合,特别是2016年两国元首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②。中欧关系领域,中国与德、法、英等传统欧洲大国保持了良好的战略合作,“中国制造2025”对接“德国制造4.0”,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中法处在“开创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此外,中国同新兴大国的关系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中国-东盟”

① [美]杜赞奇著,黄彦杰译:《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8-230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新华网,2016年6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26/c_1119111895.htm。

等框架下也实现了稳步发展^①。实践的结果证明,“新型大国关系”在认识上是正确的,为进一步的理论深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实践

“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②,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东西方学界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分析都突出了一个关键词:不确定性。在无政府状态下,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在现实与心理上构成双重冲击,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创造了历史条件^③。

4.1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

首先,单一大国(即便是超级大国)缺乏绝对主导全球性议题的能力,无论是针对传统议题还是新兴议题。^④美国两场反恐战争耗资巨万却成效甚微,伊斯兰国崛起、欧洲难民危机都源于这两场战争开启的潘多拉魔盒。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新兴问题上,美国领导力的下降更为明显,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力获得显著提升^⑤。其次,改革当前国际秩序的不合理部分,实现新的确定性需要大国间的协同。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大国都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将中国视为挑战者更多是源自于西方大国的想象而非事实。中国多次重申,自身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愿意作改革者。中国的主张是改革国际秩序中不合理的部分,而非全盘否定秩序本身。再次,现实世界冲突的高代价性需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美国而言,彼此合作可以有效延续美国的霸权地位,增强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的合法性。对中国而言,合作可以有效维护、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可以获得切实的利益^⑥。一旦中美陷入对抗,诸多国家将在战略上面临“选边站”的艰难取舍^⑦。“新一轮的挑战只有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进行合作才可以成功应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最大

的发达国家,中美若不进行持久合作,将无法有效解决最棘手、最重要的困难”^⑧。

4.2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

第一,从理论可能性的角度看,它揭示了不同于结构现实主义的新可能性。国际关系的实践理论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认可(well-established)^⑨,它以“实践”概念为核心,以系统理论为方法充分地回答了秩序的生成与演化问题。在实践理论的框架下,行为体的行为选择不再是结构压力的结果,而是在系统环境中互动的产物。人类最基本的实践首先是生产实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人类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逻辑的演化。就

① 参见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攻坚开拓之年”,《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0页;俞正樑:“中国大国外交的突破之年——2016年中国外交”,《国际观察》,2017年第1期,第1-18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课题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稳中有进”,《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期,第8-14页。

②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人类社会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央视网,2017年5月14日,http://news.cctv.com/2017/05/14/VIDEjq03LFPLnddo2Ucsm2Ui170514.shtml?from5ogou=1。

③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局限于中美关系,但由于美国是既有世界秩序的核心受益者、主导者,因此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分析以中美关系为出发点进行论述。

④ 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not Go it Alo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77-110.

⑤ “潘基文高度评价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力”,国务院网站,2014年12月1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12/11/content_2789518.htm。

⑥ 陈玉刚:“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与国际关系格局扁平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28-34页;林利民:“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与中国对美战略”,《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9页;Zhang Jiadong, Zheng Xin, “The Rol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China-U.S. Relations: Common Ground or Contradictory Are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76, 2012, pp.623-636.

⑦ James Dobbins, “War with China”, *Survival*, Vol.54, No.4, 2012, pp.7-24; Tan Seng Chye, “Changing Global Landscape and Enhanced U.S. Engagement with Asia—Challenges and Emerging Trends”, *Asia-Pacific Review*, Vol.19, No.1, 2012, pp.108-129; Yun Sun, “Myanmar in U.S.—China Relations”, *The Stimson Center (Issue Brief)*, No.3, 2014; 王鸿刚:“美国的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期,第7-13页。

⑧ 中美联合工作小组:“中美合作:全球未来的关键”,《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6期,第4页。

⑨ Michael Jonas and Beate Littig, ed., *Praxeological Political Analysis*, Routledge, 2017, p.87.

国际关系分析而言,“国家对外行为的基础——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即具体的、历史的且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生产组织及其社会表现(社会生产关系)”^①。在系统自组织性的作用下国家行为的整体表现出趋同,但行为的趋同不是历史的终结。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时空位置,任何一种普遍的形式都存在其效用边界,更何况在系统环境的互动中还孕育着各种新的可能性^②。新型大国关系以实践为导向,从理论上揭示大国间和而不同、相互协调的可能性。第二,从现实的可能性看,大国已经普遍被纳入到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中美都是高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两者不仅相互依赖而且共同依赖于整体国际秩序的有效运行。秦亚青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过去三十年和平崛起的理论解释就在于自觉地融入国际体系的“实践”^③。此外,核武器的破坏力有效地遏制了大国间的战争冲动。

4.3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

第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实践。在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提出不仅反映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般方法,更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于未来中国道路的历史自觉。首先,自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中国再一次成为真正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国。其次,中国确信自身对于可持续和平的逻辑与美国霸权逻辑有着根本的区别。再次,中国尝试将自身的信念、逻辑转化为具体实践,而非是局限于纯粹的理论之争。十八大结束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新理念、新倡议。从具有普遍关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针对周边外交的“亲、诚、惠、容”,再到对“一带一路”的“共商、共享、共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新话语。第二,解决问题的实践。现实操作中,国家不可能去直接针对一个个细碎的问题,它需要解决的是主要矛盾——整体性问题。从整体的视角看,现代的国家制度、国际

制度自“二战”以后日渐落定为普遍现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演变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诚如沃勒斯坦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不公平的“中心—边缘”结构^④。从个体的视角看,不同国家内部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尽相同,同一国家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亦不相同。这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问题,必须要将不同空间范围内的主要矛盾在实践中加以统筹解决。第三,创新(发展)理论的实践。在十九大报告中,实现了由新型大国关系向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升华。从内容表述看,新型国际关系以“公平正义”替代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不冲突、不对抗”。从内容结构上看,新型国际关系将“相互尊重”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第二位提升到了第一位。前一个变化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关系中实质正义的伦理关怀,后一个变化反映了中国克制大国冲动的自觉意识。

在当下及未来,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实践需要统筹应对三个主要的矛盾。

一是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大国毋庸讳言将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开放对象。

二是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在供给能力与供给意愿上日趋下降,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则在不断地上升。对此,中国积极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扩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规模并加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力度等等。

三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

① 李滨、杨蓉荣:“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12页。

② 唐健:“殊途同归与分道扬镳:时空延展、世界时间和现代国家”,《国际观察》,2017年第3期,第81-99页。

③ 秦亚青著:《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导言。

④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reface.

将中国视为挑战其全球霸权的崛起大国。无论美方如何消极回应,中国始终坚持推动同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例如,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规模达2 535 亿美元的经贸大单。

中国近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明:只要大国间不仅局限于某种刻板的、封闭的意识形态,坚持以实践为导向,那么可持续和平不仅是可能的,更是现实的。

五、结 语

无论是国际格局、国际体系还是国际社会,均有其产生、变化和终结的过程。在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时代,一国以武力吞并他国的行为彻底失去了合法性依据,国家至少在理论上走出了丛林法则。从战后七十多年的国际实践看,除了印度吞并锡金以外,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大国公然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如前所述,从国际关系的整体性视角来看,人们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普遍矛盾,故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依然铿锵有力。从追求可持续和平的理想信念到理论真理的合法性奠基,再到中国自觉、自为的实践,以“发展—安全”为核心内涵的可持续和平从理论落定到现实。人们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早已超越了有形的边界,没有国家间的通力协作,只会走向零和结局。新型大国关系在时代背景与中国自身发展进程的互动中应运而生,在理论证成上融贯了系统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理论,是一个动态的理论体系。相对结构现实主义,它完成了从结构到系统、简约到复杂、静态到动态以及绝对到相对的超越。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也是中国向外界阐述“中国向何处去”的一次积极尝试。追求可持续和平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巨大的确定性,炒作重现“中华帝国”的声音可以休矣!

编辑 邓文科

Constructing a Sustainable Peace of Practice Oriented —Re-analysis of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JIN Canrong¹ ZHANG Kunpeng¹

(1.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is the product of China's long-term thinking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not only the self-awareness and self-confidence of China, but also a preliminary answer to "where is China heading?". The core goal of the new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is to pursue sustainable peace, and adhering to practice-oriented to reconcil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The practice over past five years has shown that the new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satisfied with the dual requirements of purposiveness and rationality, and its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have been preliminarily verified. As a new thing which transcends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f the west, it will certainly have a strong vitality.

Key words: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practice; sustainable peace; self-awareness of history

国家海洋局 主管
中国太平洋学会 主办

太平洋学报
(1993年创刊·月刊)
2018年1月 第26卷 第1期

PACIFIC JOURNAL
(Monthly-Publication Since 1993)
No.1 January 2018, Vol.26

编辑出版 《太平洋学报》编辑部
地址 北京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 100081
编辑部电话 010-68575728
邮箱 taipingyangxuebao@vip.163.com

Editor and Publisher Pacific Journal
Address 8 Dahuisi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Post Code 100081
Tel 010-68575728
E-mail taipingyangxuebao@vip.163.com

编辑部主任 潘 峰
编辑 龚 婷 李 亚 邓文科 刘新平
发行 编辑部
出版 海洋出版社
印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Director PAN Feng
Editor GONG Ting LI Ya DENG Wenke LIU Xinping
Circul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Publisher China Ocean Press
Printer Beijing Chaoyang Printing Co., Ltd
Distributor Beijing Bureau for Distribution of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Domestic All Local Post Offices in China
Foreign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399, Beijing 100044, China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编: 100044)

刊 号: ISSN 1004-8049
CN11-3152/K
国内邮发代号: 82-873
国际邮发代号: M5271

定 价: 38元
HK\$40
US\$40



ISSN 1004-8049



9 771004 804062

01>